

文心雕龍校注通譯

戚良德 撰

上海古籍出版社



文心雕龍校注通譯

戚良德
撰

上海古籍出版社

山東大學“985工程”二期資助項目

圖書在版編目(CIP)數據

文心雕龍校注通譯 / 戚良德撰. — 上海: 上海古籍出版社, 2008. 12

(山東大學文史哲研究院專刊)

ISBN 978 - 7 - 5325 - 5115 - 6

I. 文… II. 戚… III. K892.1 IV. K892.1

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(2008)第 171550 號

山東大學文史哲研究院專刊

文心雕龍校注通譯

戚良德 撰

上海世紀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、發行
上海古籍出版社

(上海瑞金二路 272 號 郵政編碼 200020)

(1) 網址: www.guji.com.cn

(2) E-mail: guji1@guji.com.cn

(3) 易文網網址: www.ewen.cc

新华书店 上海發行所發行經銷 上海新華印刷有限公司印刷

開本 850 × 1156 1/32 印張 20.375 插頁 5 字數 432,000

2008 年 12 月第 1 版 2008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數: 1—2,300

ISBN 978 - 7 - 5325 - 5115 - 6

1 · 2072 定價: 58.00 元

如有質量問題,請與承印公司聯繫

《山東大學文史哲研究院專刊》出版說明

山東大學素以人文學科見長。二十世紀三十年代，以聞一多、梁實秋、楊振聲、老舍、沈從文、洪深等為代表的著名作家、學者，在這裏曾譜寫過輝煌的篇章。二十世紀五十年代以來，以馮沅君、陸侃如、高亨、蕭滌非、殷孟倫、殷煥先為代表的中國古典文學、漢語言文字學研究，以丁山、鄭鶴聲、黃雲眉、張維華、楊向奎、童書業、王仲羣、趙儷生為代表的中國古代史研究，將山東大學的人文學術地位推向巔峰。但是，隨着時代的深刻變遷，和國內其他重點高校一樣，山東大學的文史研究也面臨着尖銳挑戰。如何重振昔日的輝煌，是山東大學領導和師生的共同課題。“周雖舊邦，其命維新”。山東大學文史哲研究院正是在這一特殊歷史背景下成立的，她肩負着不可推卸的歷史責任，將形成山東大學文史學科一個新的增長點。

文史哲研究院是一個專門從事基礎研究的學術機構，所含專業有中國古典文獻學、中國古代文學、漢語言文字學、史學理論與史學史、中國古代史、科技哲學、文藝學、民俗學、中國民間文學等。主要從事科研工作，同時培養碩士、博士研究生。知名學者蔣維崧、王紹曾、吉常宏、董治安等在本院工作，成為各領域的學科帶頭人。

興滅業、繼絕學、鑄新知，是本院基本的科研方針；重點扶持高精尖科研項目，優先資助相關成果的出版，是本院工作的重中

之重。《山東大學文史哲研究院專刊》正是為實現上述目標而編輯的研究叢書。感謝上海古籍出版社對出版本叢書的支持，歡迎海內外學友對我們進行批評和指導。

山東大學文史哲研究院

2003 年 10 月

前 言

《文心雕龍》的版本很多，但自從清代黃叔琳《文心雕龍輯注》出現以後，黃注本實際上已成為《文心雕龍》的通行本。近世對《文心雕龍》的校注整理大多以黃注本為底本進行，如范文瀾的《文心雕龍注》、王利器《文心雕龍校證》、楊明照《增訂文心雕龍校注》、詹鍔《文心雕龍義證》等，皆是如此。但各家豐富的校勘成果也說明，黃注本作為底本實際上問題頗多。如林其銓、陳鳳金先生在范注本基礎上所作《新校白文〈文心雕龍〉》（見張光年《駢體語譯文心雕龍》附錄一），除去范注已經表示肯定的大量校勘成果以外，又“刪改補正書中訛舛衍脫者650餘字”，僅此已近《文心雕龍》原文的百分之二。

有鑒於此，筆者以為，作為新的《文心雕龍》讀本，如果再以黃注本或者范注本作為底本，實際上已經對讀者頗為不便，也不利於幾代研究者之《文心雕龍》校勘成果的發揚。應該說，林、陳兩位先生吸收眾多校勘成果而作的《新校白文〈文心雕龍〉》是值得注意的，筆者開始頗有以此作為底本的想法；但經過仔細研讀和比勘，覺得林、陳本的體例及其不少校改或未改之處，筆者尚心有未安。因此，筆者便嘗試以范注本的原文為基礎，參照林、陳兩位先生的《文心雕龍集校合編》和《新校白文〈文心雕龍〉》，充分吸收近世諸家的校勘成果，特別是全面吸收唐寫本的校勘成果，整理出一個新的《文心雕龍》文本，作為本書的底

本。筆者整理的目標只有一個，那就是力圖最大限度地接近劉勰之原文，而不是追求文字上的最佳表達方式。因此，對通行本所改雖多，但凡改必有較早版本依據，且求其最為符合劉勰的用語習慣；前輩及筆者個別徒憑推測之校，即使看起來頗有合理之處，亦只在校注中引用、說明以供參照，而不作更改原文的依據。鑒於通行本流傳既久，為便於讀者查對，凡與通行本不同之處，皆在校注中指出最早版本依據。

應該說明的是，我雖於此盡比勘、判斷、整合之力，甚或亦有所發現，如《哀弔》篇“履突鬼門”之“履”字，王利器先生《文心雕龍校證》謂唐寫本作“復”，相沿至今，林、陳兩位先生之《集校》亦從其說；但筆者經過仔細審讀，認定唐寫本實作“腹”，而不是“復”。但總起來說，如果這個文本有助於讀者更為流暢地閱讀《文心雕龍》，甚至於更為接近劉勰的原文，那完全是幾代“龍學”家的校勘成果所賜，特別是得益於林、陳兩位先生的集校之功；如果其中有什麼不够恰當以至於錯誤、荒謬之處，那完全是我的判斷能力所致。筆者的初衷就是，力圖充分吸收並體現《文心雕龍》研究的新的校勘成果，為讀者提供一個可讀性比較強的新的《文心雕龍》讀本。《文心雕龍》已有譯注本雖多，但如此實驗，似乎還是第一次；是否可行，尚待讀者的檢驗和批評。

關於《文心雕龍》的注釋，筆者也是力圖充分吸收幾代“龍學”家的成果，並在此基礎上，作出自己的判斷。正如劉勰所說：“有同乎舊談者，非雷同也，勢自不可異也；有異乎前論者，非苟異也，理自不可同也。同之與異，不屑古今；擘肌分理，唯務折衷。”而“折衷”的標準，則當然是劉勰的本意。讀懂原文、搞清本意，乃是牟師世金先生所倡導的研讀《文心雕龍》的方法，更是注釋《文心雕龍》的出發點和歸宿。惟限於才力和學識，欲讀懂文心的原文，搞清彥和的本意，真是談何容易！正是：“雖

復輕採毛髮，深極骨髓；或有曲意密源，似近而遠：辭所不載，亦不勝數矣。”筆者的原則是，不搞煩瑣考證，但求言之有據，簡明實用，俾讀者手此一編，即可粗通文心耳。

至於對《文心雕龍》的翻譯，可以說是筆者最為著力之處。我的基本想法是：力求進入劉勰的思維，達到對原文的融會貫通；述而不評，儘量避免徑用現代文藝理論術語；追求“不隔”，傳達出劉勰的文風和氣勢。其實，所謂翻譯，首先是要看懂並理解劉勰的每一句話，然後用自己掌握的現代漢語敘述出來。既是敘述《文心雕龍》，那就應當儘可能按照劉勰的用語，理解並傳達劉勰的思想；既是用自己的話來敘述，那就要像自己寫文章一樣，體現我的特點和行文風格。不過，所謂進入劉勰的思維，所謂儘可能理解並傳達劉勰的思想，那只是一種願望；這個願望能够實現幾分，幸有劉勰原文在前，切望讀者教正。另外需要說明的是，《文心雕龍》乃邏輯性極強的理論著作，為保持其完整性，本書譯文之分段並不與原文校注之分段一一對應，且將其集中於每篇之後。此雖略添翻檢之勞，但有利於上下文義的反復體會和融會貫通。

最後，需要再次強調的是，無論校勘、注釋還是今譯，筆者乃是沿著前輩的足跡行進，因而得益於“龍學”諸家的滋養實多；尤其是吾師世金先生的口授心傳，使我終生受益。可以說，沒有牟師《文心雕龍譯注》等鴻著在前，就沒有我今天這本書的樣子；為此，學生願對牟師的在天之靈獻上最虔誠的敬意！

戚良德

2007年5月

引 論

一、劉勰的生平與著述

劉勰，字彥和，東莞莒（今山東莒縣）人。東晉時，莒縣已淪陷，晉明帝在京口（今江蘇鎮江）僑置南東莞郡，劉勰祖、父即居於此。劉勰大約生於南朝宋明帝泰始三年（467年）。其祖父劉靈真，除了《梁書·劉勰傳》提到乃“宋司空秀之弟也”以外，不見於史傳記載。劉秀之是司徒劉穆之的從兄子，為宋代司空，官位僅次於丞相。劉穆之則是漢齊悼惠王劉肥之後，劉肥乃高祖劉邦長庶男。如此以來，劉勰祖上便可追溯至漢高祖劉邦，自然是頗為顯赫的。但許多研究者指出，《梁書·劉勰傳》的這句話是不可靠的，正因如此，《南史·劉勰傳》就將其刪掉了。另外，《南史》以家傳為體例，以同宗同族者合為一傳，其中穆之、秀之一宗並無劉靈真等人；且秀之、粹之兄弟皆以“之”字為名，不大可能有一個名為“靈真”的弟弟。據此，研究者一般認定劉勰乃出身貧寒庶族。但對《梁書》本傳的這句話以及《南史》的刪節，有著不同的理解和看法，對劉勰的出身也就有著不同的解釋。

劉勰在《文心雕龍·序志》中說，自己七歲之時，夢見一片五彩祥雲，猶如錦緞般美麗，便“攀而採之”。然而此後不久，劉勰的父親劉尚便去世，無疑打碎了劉勰的美夢。《梁書·劉勰傳》說：“勰早孤，篤志好學，家貧不婚娶。”大約在劉勰二十歲左

右，劉勰的母親又去世了。為母親守孝三年以後，劉勰來到京師，舉步踏入了鍾山名剎定林寺。《梁書·劉勰傳》是這樣記載的：“依沙門僧祐，與之居處，積十餘年，遂博通經論，因區別部類，錄而序之。今定林寺所藏，勰所定也。”這句簡單的“積十餘年”，意味著劉勰幾乎全部的青春時光都是在定林寺度過的；而沙門僧祐則成為這一時期劉勰生活中關係最為密切的人。僧祐乃佛家律學名僧，劉勰跟隨其十餘年，所受影響是難以估量的。作為僧祐的得力助手，劉勰幫助其大規模地整理佛經。釐定文獻，區別部類，造立經藏，撰制經錄，“或專日遺餐，或通夜繼燭；短力共尺波爭馳，淺識與寸陰競晷”^①，最終“博通經論”，成為佛學的專家。正是在這一時期，劉勰寫下了一篇重要的佛學論文《滅惑論》。

齊明帝建武五年（498年）前後，已逾而立之年的劉勰又做了一個美夢。他夢見自己手捧紅色的祭器，跟隨孔子向南走。夢醒以後，他感到非常高興。遙想夫子當年，尚且慨嘆：“甚矣吾衰也！久矣吾不復夢見周公！”^②而今，他老人家竟然託夢於自己這個無名小卒，這難道不是重任在肩嗎？於是，劉勰“搦筆和墨，乃始論文”（《序志》）。根據牟世金先生比較精確的推斷，從建武五年至齊和帝中興二年（502年）三月^③，劉勰焚膏繼晷、兀兀窮年，以大約四載的光陰，全力結撰自己的論文之作。嘔心瀝血四個春秋，劉勰在定林寺為中華文化增添了光輝奪目的一章，並為這一精彩的華章定下一個動聽千古的美名：“文心雕龍”。

① 僧祐《法集總目錄》。

② 《論語·述而》。

③ 牟世金《劉勰年譜匯考》第50—54頁，巴蜀書社1988年版。

《文心雕龍》書成之時，正值齊梁禪代之際。劉勰身居定林十餘載，卻一直是白衣之身；既不願出家為僧，則長此以往又怎能甘心呢？回首歲月，已歷宋、齊、梁三朝；屈指青春，則近不惑之年。其人生之路通向何方，已是擺在面前的迫切問題。劉勰自然期望《文心雕龍》能够成為自己命運的新的開端，而不是像司馬遷那樣準備“藏之名山”^①。可是，以自己無名小輩，又久居寺門之內，縱有曠世驚人之作，又怎能得到時人之肯定和承認呢？於是，劉勰想到了沈約，一個歷仕宋、齊、梁三朝並成為當朝權貴，而又身兼文壇領袖的人。

《梁書·劉勰傳》是這樣記載的：“約時貴盛，無由自達，乃負其書，候約出，干之於車前，狀若貨鬻者。”干載之下看來，這實在是頗富戲劇性也頗有喜劇性的一幕；然而不難想見，劉勰邁出這一步，實在需要很大的勇氣，甚至要承受不少痛苦的折磨。不過，事情出人意外的順利。《梁書·劉勰傳》云：“約使命取讀，大重之，謂為深得文理，常陳諸几案。”沈約無愧為一代文壇領袖。其“使命取讀”的態度顯示了他的貴而無驕，其“大重之”的激賞證明了他獎掖後進之無私，其“深得文理”的評價說明了他的目光深邃，而其“常陳諸几案”的舉動則尤屬難能可貴！

梁武帝天監二年（503年）前後，劉勰“起家奉朝請”^②。“奉朝請”者，奉朝會請召而已，既不為官，亦無職任；但既已“奉朝請”，則正式踏上仕途便指日可待。第二年正月，揚州刺史、臨川王蕭宏進號中軍將軍；其開府置佐，網羅幕僚，劉勰有幸成為他的記室。記室之位雖然不高，然其專掌文翰，職務乃是頗為重要的。劉勰一入仕途便成為梁武帝之弟蕭宏府中記室而居樞要

① 司馬遷《報任安書》。

② 《梁書·劉勰傳》。

之職，可謂幸運了。一年以後，劉勰轉為車騎將軍夏侯詳的倉曹參軍。此次改任，並非職務的升遷，不過夏侯詳德高望重，其車騎將軍之位亦高於中軍將軍，這對劉勰而言，自然是值得欣慰的。天監六年（507年）六月，夏侯詳被徵為侍中、右光祿大夫，劉勰亦離開倉曹之職，出為太末（今浙江龍遊）令，走上治理一方的為官之路。《梁書·劉勰傳》特地記載了劉勰治理太末令的結果：“政有清績。”文字可謂簡略之至，但作為父母官，沒有比為官的清明和清廉更重要的了。

劉勰任太末令三年期滿以後，被任命為仁威南康王蕭績的記室，兼太子蕭統的東宮通事舍人。蕭績乃梁武帝第四子，聰警異常，梁武帝愛之有加；所以簡拔劉勰為其記室，乃是莫大的優渥。更為重要的是，劉勰同時成為東宮之主、太子蕭統的通事舍人，則其受到梁武帝的信任，是顯然可見的。若以職位而論，東宮通事舍人之職位列末班，官品固低；但東宮官屬的選拔，或以出身世家大族而聲名清要，或以才華出色而衆望所歸，其嚴格謹慎，是一般職位所不能比擬的。

關於劉勰和蕭統的關係，《梁書·劉勰傳》只有這樣一句話：“昭明太子好文學，深愛接之。”劉勰以知天命之年而奉事蕭統，且有“深得文理”的《文心雕龍》名世，其深得“愛接”自是情理之中的事情。但不少研究者也有這樣一個疑問：所謂“昭明太子好文學”決非虛言，不僅他為後世留下的一部《文選》可以作證，而且其“愛接”文士的種種具體情況，史書亦多有記載；何以身為他的通事舍人的劉勰，除了一句泛泛的“深愛接之”，就再也找不到其他有關的記述了呢？

據筆者的揣測，蕭統以對“文學”的愛好而對劉勰青眼有加，彥和本人卻未必引以為幸事。文章之於劉勰，固然是立身之本，甚至可以說，沒有嘔心瀝血的《文心雕龍》，就不會有他的仕

途生涯；然而，所謂“士之登庸，以成務為用”，所謂“安有丈夫學文而不達於政事哉”（《程器》），劉勰的人生目標決非只是一個文人；其所以躋身仕途，也決非以一個御用文人為滿足。正是在這裏，蕭統與劉勰就有了巨大的差異。以太子之位，天下遲早運於掌上，軍國大政反而變成平常之事；對文學的愛好和重視，既是題中應有之義，更屬錦上添花，自然無可非議。而對劉勰來說，如果僅僅以“文學”而受到太子的“愛接”，隨其遊宴雅集，隨其制韻賦詩，或者為其《文選》的編纂出謀劃策，從而混同東宮衆多的文士，那麼，離其人生目標可就相去遠矣！

事實也證明，劉勰考慮的問題並非文學之事。《梁書·劉勰傳》較為詳細地記述了這樣一件事情：“時七廟饗薦已用蔬果，而二郊農社猶有犧牲，勰乃表言二郊宜與七廟同改；詔付尚書議，依勰所陳。”天監十六年（517年）四月，隆佛正盛的梁武帝曾下詔，要求天子宗廟的祭祀品不能再用犧牲（家畜），因其與佛家不殺生之旨不合；至十月，梁武帝再次下詔，因為宗廟祭祀雖已不再用犧牲，但還有乾肉一類的東西，詔書要求改用蔬果。這就是所謂“時七廟饗薦已用蔬果”。不過，梁武帝的兩次下詔，皆引起“公卿異議，朝野喧囂”^①，甚至有不服從詔命者；而祭祀天地社稷之神的郊社之祀，仍然使用犧牲。這便是劉勰上表的用意了，他認為既然天子七廟之祭祀已經改用蔬果，二郊農社之祭祀亦當與七廟相同。

顯然，劉勰的表奏是符合梁武帝之意的。天監十七年（518年），五十二歲的劉勰升遷步兵校尉，仍兼東宮通事舍人。步兵校尉職掌東宮警衛，位列六品；較之屬於九品的通事舍人，無疑是連升三級了。歷任此職者，皆士林名流，則劉勰之遷任，既為

① 《南史·梁本紀上》。

榮升，更是殊遇。所以此時的劉勰，可謂一生中最為幸運和輝煌的時期了。

然而，當劉勰苦苦奮鬥、孜孜以求數十載，終於看到希望的曙光之時，這扇希望的大門卻又緩緩關閉了。天監十八年（519年）四月，梁武帝於無礙殿親受佛戒，法名冠達，從而掀起崇佛的高潮，劉勰亦接到詔令：解除步兵校尉之職，與慧震和尚一起，回定林寺編纂經藏。其實，正值梁武帝隆佛之時，把編集經藏的任務交給劉勰，算得上信任之舉。而且，此時僧祐去世不久，令劉勰回到定林寺整理佛經，也是合乎情理之事。然而，這對升任步兵校尉之職剛滿一年的劉勰來說，不能不說是相當殘酷的。

可以想見，回歸定林之路是漫長而又無奈的。遙想三十年前，當劉勰初次踏上定林寺的石階時，雖同樣是無可奈何，甚至是走投無路，但並沒有失去希望；他身居佛寺十幾年卻並未剃度出家，正是堅信總有一天會走出佛門，走上輔時報國的人生通衢。未曾料到的是，三十年後竟重返定林寺！時過境遷，物是人非，望著定林寺熟悉的僧房，劉勰又當作何感想呢？

對劉勰來說，整理、編訂經藏的任務可謂輕車熟路，用不了太長的時間。但是完成任務以後呢？細思蕭梁王朝對他的態度，劉勰不能不感到與其希望實在是相去甚遠。太子蕭統的“愛接”有加當然並非虛情，然而如上所述，在太子的眼中，劉勰似乎只是一個文人；或者說，其文士的身份更令蕭統感興趣；太子優禮以待者，正因其文才。與太子一起談文論詩，甚至助其編輯《文選》，當然也是一些文人夢寐以求的事情，但卻決非彥和所願。梁武帝對他的注意似乎與蕭統有所不同，但也顯然並未著眼軍國大政而予以安排任用。在隆佛至極的梁武帝的心目中，東宮步兵校尉之職是遠不如整理佛經重要的，這就是劉勰不

得不面對的現實。

從熙熙攘攘的俗世再次沉潛佛國，我們難以揣度劉勰的心境發生了怎樣的巨大變化，但這種變化顯然是存在的。他也許終於真正理解了什麼是佛，理解了人們為什麼要出家，理解了那永不疲倦的暮鼓晨鐘的真正含義。他也許有一種終於參透世事的大徹大悟，但不知他是否會有覺今是而昨非的痛悔？所謂“摛文必在緯軍國，負重必在任棟樑；窮則獨善以垂文，達則奉時以騁績”（《程器》），看來“緯軍國”、“任棟樑”的“奉時騁績”之夢是不可能最終實現了，然而“獨善其身”之路，除了“垂文”，更徹底的自然是出家為僧。梁武帝普通二年（521年），完成整理佛經任務之後的劉勰上表“啓求出家”^①。他先用火燒掉了兩鬢之髮，以表明自己出家之念已不可動搖。其實，梁武帝自己都能“捨身事佛”，何況他人？劉勰終於穿上緇衣，改名慧地，皈依佛門。出家不到一年時間，劉勰即辭別人世，享年五十六歲。

關於劉勰的卒年，尚有種種不同意見，如李慶甲先生考定：“劉勰，這個中國文學批評史上傑出的理論家，他的生年當是公元四六五年左右，他的卒年是公元五三二年，總共活了六十七八歲。”^②新版《辭海》就採納了李慶甲先生的意見。實際上，由於資料的缺乏，關於劉勰生平的許多問題，都尚無定論而需要進一步探討。

現存劉勰的著作，除了《文心雕龍》以外，可以肯定的尚有《滅惑論》和《梁建安王造剎山石城寺石像碑》兩篇。前者近三千字，是一篇佛學論文；後者二千三百餘字，是一篇碑文。除此之外，中古時期近三萬字的《劉子》一書，也有學者認為是劉勰

① 《梁書·劉勰傳》。

② 李慶甲《文心識隅集》第9頁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。

的著作，這是一個尚待研究的重要問題。

二、《文心雕龍》的樞紐論

《文心雕龍》全書五十篇，其結構經過精心安排而部伍嚴整，其理論觀點之間講究次序而回環照應、互相補充而邏輯嚴密，形成一個完整、精密的系統。在中國文藝理論和美學史上，具有如此完整、系統而龐大的理論體系的著作，可以說是獨一無二的。

《序志》有云：“蓋《文心》之作也，本乎道，師乎聖，體乎經，酌乎緯，變乎騷；文之樞紐，亦云極矣。”這段話包含了兩層意思：一是就《文心雕龍》的理論體系而言，乃是以道為根本、以聖人為老師、以儒家經典為主體、以緯書為參考、以《離騷》為變體，從而體現出劉勰論文的基本思想；二是就文章寫作而言，“為文”的根本問題，也都包含其中了。研究者一般將起首五篇稱之為《文心雕龍》的總論。筆者以為，還是劉勰所謂“文之樞紐”更為準確，因此，我們將這部分稱之為“樞紐論”。

《文心雕龍》以“原道”開篇，正如紀昀所評：“自漢以來，論文者罕能及此，彥和以此發端，所見在六朝文士之上。文以載道，明其當然；文原於道，明其本然：識其本乃不逐其末。”^①其實，劉勰對文學現象所作形而上的哲學思考，不僅在六朝文士之上，而且在整個中國古代文論中，也是不多見的。這種思考，也不僅是“明其本然”的問題，而且表徵著文藝觀念的真正自覺，因而具有劃時代的意義。

《原道》之“道”，劉勰沒有予以具體規定和說明，而是作為

^① 黃叔琳注、紀昀評《文心雕龍輯注》第23頁，中華書局1957年版。